



北京佛教造像艺术述略

朝 西

在新近落成开放的首都博物馆中，专辟有一个“佛造像”展厅，里面陈列了在北京出土、制作的不同时期、不同材质、不同题材的佛教造像。这些造像以实物形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佛教在北京地区的传播。本文以首博馆藏造像为线索，简述北京地区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变化。

北京地区古代称为燕地，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属石氏前赵、后赵统治。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中，就多处记载了石勒、石虎笃信佛教，请僧、供养、造像、流布等事。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的后赵建武四年（338）铜镀金禅定佛，就是最好的证明。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而北京地区位于中国北部，所以属于北朝。据《魏书·释老志》载：“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经郡国佛寺，见沙门道士，皆致精敬。可见在北魏建立之前，北京地区的佛教已经有了广泛的发展。由于北朝统治者对佛教的信仰和推崇，当时的人们也争相参与到建寺

造像的活动中来。那时的北京地区，先后经历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四朝统治，其间兴建了诸多寺庙，现在可查且比较有代表性的佛寺有：光林寺、尉使君寺、奉福寺、石佛殿、大安寺、木严寺、佑圣教寺、天开寺等。修建佛教寺院，其中一个重要且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铸造佛像。现存的北朝佛教造像的数量，可以说还是比较多的。从造像的材质上看，可以分为铜和石两大类。难能可贵的是，北朝各个历史时期的佛教造像，目前都有遗存。

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北魏太和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见中插一），就是北魏时期佛教造像的代表。该造像通高27厘米，释尊结跏趺坐，头部高昂，发呈涡旋状，顶有高肉髻，面颊丰腴，大眼细长，神态威严。身着袒右肩袈裟，右肩披偏衫，胸前衣领上饰折带纹，与山西大同云冈大佛袈裟上的装饰文样一致，衣纹写实厚重。右手结施无畏印，手势亲切自然。四足座床浑朴稳重，其正前方和两个侧面刻画飞鸟、蔓叶、胡人装束

的供养人、卷云等纹饰和图案，座后刻有“大代”等铭文，体现了北方鲜卑民族雄阔健硕的形象特征和文化气质，代表了北魏金镀铜造像的最高艺术水平。

再有就是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石雕释迦牟尼佛与二胁侍菩萨像”（见中插一），该造像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大的早期佛教雕塑。主尊为释迦牟尼佛，跏足站立，头部高昂，身着袒



图一

右肩袈裟和僧裙，躯体健壮，气势雄阔，具有北魏太和时期造像鲜明特点。主尊内侧为合掌恭立的二胁侍菩萨，身后为舟形火背光，背光后上半部有一二排小佛像，下半部有造像题记及捐资人名。此像年代历来争论颇多，从主体风格看为魏太和时期雕造无疑。但主尊的头饰、衣纹，两侧的胁侍菩萨造型，背光前后的装饰性雕刻等，与当时风格明显不符，应为北魏太和之后重修。此像原在海淀区车耳营村，1998年失窃追回后，由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

东魏时期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当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的“东魏天平三年（536）赵俊兴造像碑”为代表。该碑通高135厘米，正面开龕，雕有一佛二菩萨。主尊结跏趺坐，左手结施与印，右手结施无畏印，身着袈裟，面颊长圆，脖颈细长，后有莲瓣项光。二菩萨立于莲座之上，头戴花冠，身着长裙，胸前饰有璎珞。该造像体现了东魏时期佛教造像承上启下的艺术风格。

北齐时期现存的北京地区佛教造像数量较多，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的“北齐天保十年（559）周双仁石造像碑”、“北齐天统五年（569）潘景辉石造像碑”、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北齐武



图二

平五年（581）明王石造像碑”（见图一）、“北齐天统二年（566）王永业石造像碑”和“北齐天保二年（551）铜菩萨像”等。这些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一致，都带有很强鲜卑特征。

隋唐时期，是整个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北京地区已称作幽州，在整个城郊范围内，有近百座佛教寺庙，其中幽州城内就有近20座佛教寺院。像房山云居寺、盘山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从现存的隋唐时期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来看，其出土地点大都分布在现今北京房山地区，可见当时房山地区佛教发展的兴旺。

隋代佛教造像艺术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影响，一方面继承了北齐、北周佛教造像艺术的遗韵，同时又表现出新的发展与变化。首都博物馆馆藏的“隋开皇二年（582）一佛二菩萨石造像碑”（见中插二），是隋代北京地区佛教造像的典型实物。该造像通高18.5厘米，材质为黑色大理石。中央主佛结跏趺坐，右手结施无畏印，左手结施与印。佛两侧各立一菩萨，底为方形台座，两侧各蹲有一狮。造像的面相方而不圆，广额丰颐，躯体敦实，脖颈细长，全身比例失准，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点。

唐初期的佛教造像,以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唐贞观九年(635)观音菩萨铜像”(见图二)最突出。该造像通高15厘米,菩萨头戴宝冠,宝冠两侧垂有联珠宝缯。菩萨脸型瘦长,上身袒露,下着长裙,衣纹简洁,胸前饰有璎珞。两手上下置于胸前,背光呈火焰状,上有残缺。座床下有四足,座床上刻有铭文。此尊观音菩萨铜像,基本保留了隋代造像的遗风。

唐中期的佛教造像,以首都博物馆馆藏的“铜镀金弥勒佛像”为代表。该造像通高11厘米,弥勒结跏趺坐,左手结说法印,右手置右膝上,顶现肉髻,佛面圆满,神态庄严。身着袈裟,纹路自然,腹部与腿部之衣纹刻画,表现出佛衣的轻柔飘逸。佛像比例匀称,质感细腻,造型大气,为盛唐时期的经典之作。

唐晚期的佛教造像,以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在北京西城区出土的“铜十一面观音菩萨像”(见中插二)为代表。十一面观音源于北周印度高僧耶舍崛多翻译的《十一面观音神咒经》。该造像为汉地流行的十一面观音标准形象,头顶小佛头堆叠排列,正中有一立佛,面形圆润,神态平和,身着长裙,衣质轻薄贴体,双臂挽帔帛,亭立于束腰莲花座上,体态优美大方。

唐代以后,契丹和女真两个民族先后以北京为都城,建立了辽、金政权。辽、金两朝的统治者,皆大力尊崇佛教,北京地区因此也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在这一时期里,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从艺术及工艺水平上来看,远不能与唐代相比,但其在风格及题材上,表现出民族化、世俗化的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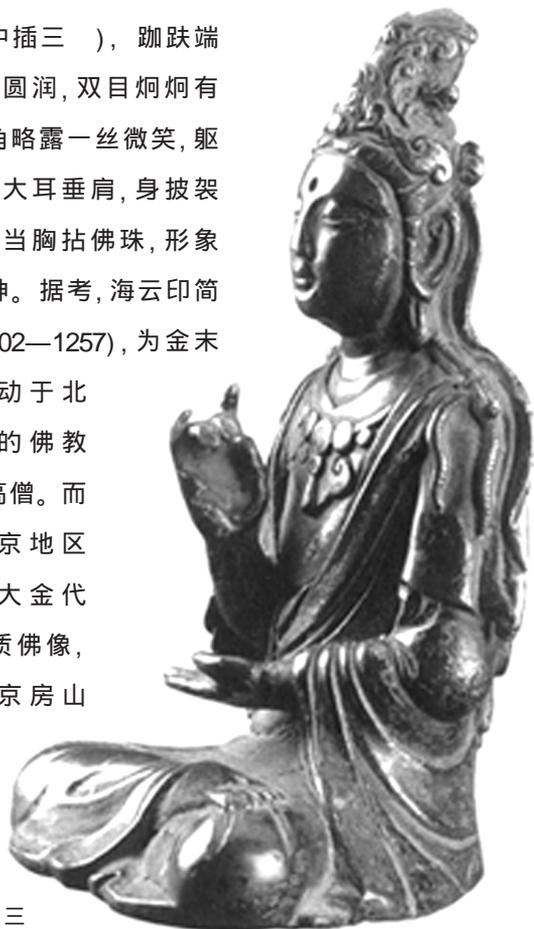
辽代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材质多样,且大多以浮雕为主,如北京天宁寺塔周的浮雕。而现存的唯一一尊圆雕佛像,为首都博物馆馆藏的、于1977年在北京房山北郑村辽塔出土的“释迦牟尼佛涅槃像”(见中插三)。该造像侧身卧于石床上,头饰螺发,头顶肉髻微隆,面相生动,神态安详。身着袒右肩袈裟,胸前露出蝴蝶结,衣纹写实自然。风格粗犷,形象地表现了释迦牟尼佛涅槃时情景。

而首都博物馆馆藏的“辽彩绘释迦牟尼佛像”,则为辽代陶瓷造像的代表。该造像跏趺端坐,头饰螺发,

头顶现高肉髻,大耳垂肩。面相丰满,眉间有白毫,双目俯视,神态宁静。身着袒右肩袈裟,袈裟上涂有朱彩。左手当胸,右臂残断,两手似结转法轮印。此佛像对研究辽代佛像艺术及北京地区陶瓷艺术具有重要价值。

辽代北京地区佛教造像所表现的题材,除了显教的诸佛、菩萨外,还有像五方五佛等密教内容,而其中以观音造像最为流行。辽太宗耶律德光就十分信奉观世音菩萨,据《辽史》卷四九礼志记载:“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首都博物馆馆藏的“铜观音像”(见图三),就是一个实物证明。

金代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基本承袭了辽代的风格,材质也十分多样,如首都博物馆馆藏的“铜镀金观音菩萨像”,北京昌平区银山金代佛塔之浮雕等。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在北京双塔庆寿寺海云塔基出土的“金末元初海云印简禅师”(见中插三),跏趺端坐,面形圆润,双目炯炯有神,嘴角略露一丝微笑,躯体肥胖,大耳垂肩,身披袈裟,右手当胸拈佛珠,形象生动传神。据考,海云印简禅师(1202—1257),为金末元初活动于北方地区的佛教临济宗高僧。而目前北京地区现存最大金代圆雕石质佛像,当为北京房山



图三



图四

区白水寺的“一佛二弟子像”，其主尊佛像高达5.8米。

与辽、金政权同时期的宋朝，虽然没有定都北京，但由于宋代烧瓷工艺的发达，也影响到了北方地区。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在北京丰台出土的“宋青白釉反瓷观音菩萨像”（见中插二），通体素白，仅袈裟边缘施青白色釉。该造像结跏趺坐，头梳高发，戴宝珠花冠，花冠正中塑有小化佛。袈裟自头顶披下，露出面部及前胸，宽额丰硕，眉间饰白毫，丹凤眼微睨，神态安详，胸前缀有璎珞及丝带。胎质洁白细腻，塑造精巧，体现了宋代佛教造像和陶瓷艺术相结合的鲜明的时代特点。

公元1234年，金朝被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军队消灭。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伴随着蒙古族的统治，藏传佛教开始逐渐在北京地区流行。而在元世祖忽必烈的统治时期，尼泊尔工匠阿尼哥的到来，更将

元代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工艺水平推向了高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尊“元代铜镀金藏式佛教造像”，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刻有明确纪年铭文的元代藏传佛教金铜造像。北京昌平区居庸关云台上，也存有元代浮雕藏传佛教造像。

除了藏传佛教造像外，元代也有大量的汉传佛教造像。如北京香山卧佛寺内的“铜镀金释迦牟尼佛涅槃像”，就是元代佛教造像中的精品。该卧像铸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全长5米多，重达50余吨。释尊微闭双目，右胁而卧，右手托腮，左手搭跨，庄严安详。再有就是供奉于北京广济寺圆通殿内（现移至北京法源寺）的“金铜质观音菩萨像”（见图四），其工艺水平更是高于卧佛。该造像通高约1米，菩萨头戴华冠，横披天衣，左腿下垂，右腿曲支，右手搭于右膝之上，全身装饰繁缛，呈现出雍容华贵、体态安详的宗教美感。

除了铜质造像外，元代瓷质造像也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在北京昌平出土的“元青釉释迦牟尼佛像”（见图五），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该造像跏趺端坐，双手结禅定印，头顶肉髻微隆，面相沉静，上身披双领下垂式袈裟，下身着裙，胸前饰有“卍”字。脸、胸及手裸露部分不施釉，呈赭褐色。莲座下承以束腰六棱形基座，基座上层六个棱面印各种花卉，束腰部饰卷草纹，下为垂云纹，体现了元代佛像注重世俗情趣的艺术特点。而于1969年在北京西城区定阜大街西口出土的“青白釉观音菩萨像”，也是这类造像的精品，只可惜出土时部分受损。

到了明代，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仍然保持着藏传和汉传两种形式。明朝皇宫中一如元朝，设有专门的造像机构“佛作”，制作藏式佛像。明代宫廷造像始于明成祖永乐年间，终于明宣宗宣德年间，至今没有发现一尊造于宣德以后明代宫廷藏式佛像。现存的明代宫廷藏式造像，大都带有“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款（见图六）。除了宫廷造像外，明正统、景泰、成化、正德、崇祯等各个时期的佛教造像实物，目前都有遗存（见图七）。而在造型和工艺上，汉传佛

教造像比起藏传佛教造像,则有很大差距。由于当时佛教在汉地的信众越来越多,修庙塑像频繁,使得佛教信仰进一步民间化、世俗化,受此影响,明代汉传佛教造像也就呈现出工艺单一、形象呆板、缺乏个性的特点。

与此不同的是,明代北京地区民间佛教造像活动十分活跃,如首都博物馆馆藏的“石叟款铜观音像”,就是一尊民间造像的典型代表。该造像的材质为红铜,周身嵌有银丝。造像的左手可自由拆卸组装,手心既可向上,亦可向下,分表不同佛教内涵。造像背后,有嵌银丝“石叟”铭款。石叟为明崇祯时期佛教僧人,善铸铜,生卒年不详,《梦窗小牖》载:“善制嵌银铜器,所作多文人几案间物,精雅绝伦,款石叟二字多在底,体兼篆隶,亦朴拙无俗韵。”

首都博物馆馆藏的“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彩水月观音菩萨像”(见中插四),头梳高髻,面目娟秀,神态安详。上身天衣横披,手挽帔帛,胸前饰瓔珞,下身着长裙。菩萨半跏趺坐于象征观音道场的补陀洛迦山的岩石形台座上,姿态自然闲适。全身肌肤施白釉,衣饰用黄、绿、酱、黑四色釉表现。台座正面雕有一条飞腾的蛟龙,标明观音是坐在海岛上,龙是他的坐骑,座后有“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匠人”题记。又如首都博物馆馆藏的“明铜漆金菩萨像”,头梳高髻,面相庄

严肃穆,躯体丰腴修长。上身横披天衣,饰有瓔珞珠宝与钏镯,下身着长裙,衣质轻薄贴体,衣纹流畅自然。该造像体态优美,装饰华丽,雍容华贵,堪称明代佛像上乘之作。

随着清兵入关,明朝灭亡。清朝统治者除了定都北京外,在佛教信仰上亦大力尊崇“黄教”,可以说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造像工艺水平,在清代得到了又一次提升与发展。而传统的汉传佛教造像,则无太多新意,基本承袭了明代繁缛庸俗的风格。

清代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以康熙、乾隆两朝的宫廷造像为代表,而又以康熙朝水平最高。如首都博物馆馆藏的“药师佛像”,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尊康熙纪年造像。该像造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通高17厘米,结跏趺坐,双手结印,螺发肉髻,袒露右肩,身着袈裟,上有各种植物纹饰,雕刻精细,是康熙佛装造像的精品。相比之下,乾隆朝的佛教造像水平则略逊一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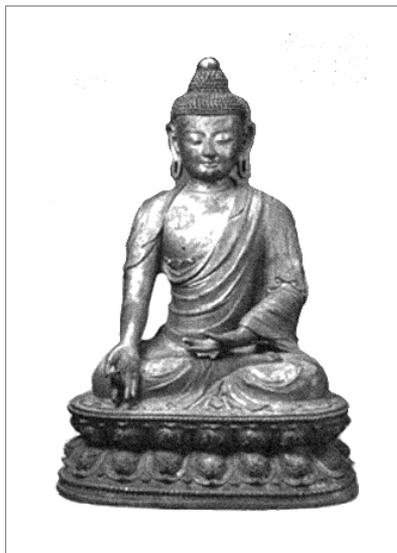
首都博物馆馆藏的“清仿尼泊尔或帕拉风格铜泥金度母像”(见封三),全身装饰繁缛,多处嵌银镶宝,面部泥金,做工精细,体现了清初仿古造像工艺特点。再有首都博物馆馆藏的“清铜镀金四世班禅喇嘛像”(见封三),生动地表现了四世班禅不同凡俗的形象特征,是一尊艺术水平极高的人物肖像。四世班



图五



图六



图七

禅(1570—1662),法名洛桑却吉坚赞,是西藏政教史上最具有影响的高僧之一。这尊造像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头无冠,后脑勺奇大,额部鼓起一个大包;双目睁视,鼻梁挺直,双唇抿起,下颏尖凸,颧骨高隆;内着僧坎、僧裙,外披袒右袈裟和僧氅,衣纹流畅有力;右手置右腿上结触地印,左手置脐下结禅定印。仰莲座上满刻藏文铭文,内容是说此像的内膛奉有四世班禅的生身舍利,功德无比殊胜。

佛教自东晋时期传入北京,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对北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观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可以说其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其造像水平及材质、工艺,也是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历史的变迁而逐渐发展的。这些历经劫难、保存至今的佛教造像精品,不仅是弥足珍贵的文物,更是传承佛教精神与中华文明的载体。

中国佛学院举行 2006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

本刊讯 6月26日,中国佛学院举行2006届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担任此次答辩委员会主席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曾文教授。担任评委的是: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研究生导师传印法师,中国佛学院教务长、研究生导师向学法师,中国佛学院研究生导师姚长寿教授,中国佛学院研究生导师王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魏道儒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文明教授等7位教内外专家学者。中国佛学院有关领导和部分任课法师及2005级的全体研究生参加了答辩会。

答辩会开始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一诚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常务副院长圣辉法师专程赶来接见答辩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毕业研究生的导师及毕业研究生,并在教学楼前合影留念。圣辉法师还作了重要讲话。

本届毕业的研究生共有6位,分别是:净土学研究生正澄法师、戒律学研究生觉灯法师、华严学研究生昌如法师、三论学研究生体恒法师、唯识学研究生宽昌法师、天台学研究生宽见法师,所提交的毕业论文分别是《昙鸾往生论注研究》、《八敬法刍议》、《十重唯识研究》、《吉藏大师的涅槃思想研究》、《唯识止观法门研究》、《天台性恶思想》。

答辩会参照普通高校研究生论文答辩的程序进行。答辩委员会主席首先宣布参加答辩的研究生名

单及其所提交的毕业论文题目,接着进行具体答辩。先是研究生陈述自己毕业论文的内容,答辩委员会主席和各评委分别对论文进行点评、提出问题;其次是下一位研究生陈述论文内容、答辩委员会点评和提出问题;然后才是前一位研究生回答问题。每位答辩研究生进行论文陈述前,由其导师介绍该生的学习和论文指导情况,广如教务长代表教务处宣读三年来该生公共课和专业课成绩及修学情况的评语。

六位研究生先后进行了精彩的答辩。评委们对所有论文进行了认真的点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一致认为,参加答辩的所有论文学术规范、结构谨严、资料翔实、说理清晰,在某些问题上有着自己的创新和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评委们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答辩结束后,评委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答辩全部获得通过。随后,教务长向学法师对答辩会进行了总结,指出,本届参加答辩的论文,既体现出纯正的学风和较为深厚的佛学理论水平,也折射出僧人虔诚的宗教情操,达到了中国佛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预期目标。随后,一诚院长亲自逐一向6位研究生颁发了毕业证书,并表示热烈祝贺;正澄法师代表本届研究生致答谢词,感恩母校和师长。

据悉,中国佛学院自1980年恢复办学以来,已培养了十届共46名硕士研究生。

(中国佛学院)